

以文藝進行社會實踐

陳瑞祥

為了替畫家寫下生命故事，為了追溯台灣戰後現實主義文藝的流變，為了理解台灣左翼精神的發展，由此展開的一段追尋……

2012年2月到6月，「尋畫——現實主義畫家吳耀忠」系列展覽在紫藤廬、宜蘭縣文化局、清華大學藝術中心、白屋陸續舉行，其間共舉辦了五場座談會，總主題是「以文藝進行社會實踐」。第一場座談會的主題是「從1970年代走來：文藝做為一種社會實踐的軌跡」，由楊渡、徐璐、鍾喬、陳素香擔任與談人；第三場的主題是「傾聽1980年代的風雷：在文藝與政治之間的社會實踐道路」，由鍾喬、王智章、黃崇憲擔任與談人。這裡收錄的楊渡、徐璐、陳素香、王智章的文章，正是他們四位就發言稿改寫而成的專文¹。

1 鍾喬的文章〈也是革命者的鐵屋——在吳耀忠回顧展的連想〉刊登於立報2012-4-12。參見<http://www.lihpao.com/?action-viewnews-itemid-117144>。黃崇憲在座談會中的報告，其中一部分轉化為刊載於本期《思想》的專文。王智章的文章原本將刊載於《人間思想》第二期，經陳光興主編慨允並徵得作者同意後轉由本輯刊出，於此謹致謝忱。

以反思做為紀念

楊渡、徐璐、鍾喬、陳素香、王智章、黃崇憲都生於1950年代後半，在1970年代受到現實主義文藝的影響，並於1980年代初隨著個人機緣投身實踐。雖然機緣不同，但彼此間卻有著以現實主義文藝精神所貫通的內在聯繫，不同的生命軌跡也因此而有了交會。楊渡、徐璐、鍾喬、陳素香等人曾經共同參與了《大地生活》雜誌的發行、編輯、撰稿。《大地生活》雜誌在發行十期之後就因經濟難以為繼而結束，之後因為這個平台而聯繫起來的四個人各自尋找新的實踐場域。楊渡在中時報系擔任記者、主筆，將寫詩的筆轉而用於記錄海峽兩岸的社會變動，今日擔任中華文化總會秘書長，並創辦南方家園出版社，以出版傳播左翼人文；徐璐到《自立晚報》、中華電視台等媒體工作數年，而後在社區及部落的工作中聯繫回原初對於土地歸屬的嚮往與感動，與友人共同設立台灣好基金會推動在地文化與產業；鍾喬在參與《關懷》、《大地生活》、《人間》等雜誌的編輯之後，轉而在1990年代投身民眾戲劇，創辦差事劇團，一方面以做為藝術表現的戲劇進行現實批判，一方面以做為組織方法的戲劇進行民眾培力；陳素香離開報社後投入勞工運動，目前在台灣國際勞工協會(TIWA)繼續為勞工爭取權益，並發展出以紀錄片來訴說移工故事並讓移工自己訴說故事的文藝實踐；人稱麻子的王智章在1984年參與組織原權會後，於1986年與友人成立「綠色小組」，以攝影機在社會運動的現場拍下一部部影片，呈現被主流媒體所掩蓋的真相，並且在今日仍繼續以攝影專長，參與風災後的部落重建工作；黃崇憲則在台北德惠街住處創造了當時社運參與者聚會進行政治、社會批判的重要空間，並在經歷社運風潮之後，投身

社會學研究，成為今日的公共社會學家。正是在德惠街，崇憲和麻子、楊渡、徐璐、鍾喬、香香，以及許許許許的朋友在黨外的旗幟下聚會、飲酒、高談闊論、相互取暖。也是在那裡，崇憲認識了被徐璐帶過來的吳耀忠。

我們邀請這幾位當年吳耀忠先生眼中的「年輕朋友」，一起來回顧自己從1970年代以來的生命經歷，述說自己在成長過程中如何接觸了現實主義文藝，如何投入社會實踐，由此呈現與吳耀忠認識的因緣，進而反思文藝與社會實踐兩者關係在戰後台灣的流變。透過這樣的安排，希望能讓這場紀念不只停駐在一個帶著生命遺憾的歷史段落中，並且能夠轉化為實踐經驗的反思，呈現出生命及歷史延續的意義，既和吳耀忠所處的世代對話，也為來者提供思考問題及反省實踐的素材。

以文藝進行社會實踐

文藝如何變成社會實踐？這個問題可以從三方面來考察：個人的實踐歷程；不同時代條件下以文藝進行社會實踐的路徑、作用與限制；文藝創作與社會實踐的親和與緊張。

社會運動有其生命，會隨著歷史條件所提供的動能而萌發、興盛、常態化，乃至滅散為歷史的一個註腳。但回到個人的實踐歷程來考察，我們卻會發現，在運動轉化或結束的同時，參與運動的行動者也開始尋找新的社會實踐場域、探問另一種社會實踐的可能性。從個別運動來看，是沉寂了；但就個人的生命來看，卻是延續的。

延續，不只是個人生命實踐的軌跡，並且是在不同世代行動者之間的意義傳遞。就如同陳素香在文中寫道，年長之後回看，才明

白自己經歷的這一切並非偶然。在生命的緣遇及會聚中，我們所經歷的事，在心裡埋下了一顆種子，隨著歷史條件而開展出行動的方向、目標及動力。

然而個人生命軌跡不能不帶著時代的印記。1970年代後期的鄉土文學論戰將先前的現實主義文藝實踐，拓展為文藝與社會關係的討論；1979年的美麗島事件，刺激了更多青年投入社會及政治的批判。邁入1980年代，黨外雜誌前仆後繼地出版；文學(文字)與美術(影像)辯證地結合，表現為小劇場、民眾紀錄片等新的文化實踐。1980年代的台灣，風雷不在遠方，而在島嶼激揚迴盪。經歷了現實主義文藝洗禮的青年，在新的時代條件下投身不同的實踐場域。如果說在1970年代，文藝是青年在尋求社會實踐時，蜿蜒在眼前的少數可能道路，那麼到了1980年代，文藝已不足以表達青年的思想及情緒。另一方面，政治控制鬆動所開啓的條件，也讓直接的社會批判及衝撞變得可能，文藝場域的實踐轉而開展出政治場域的實踐，在1970年代開展的文學性公共領域，到了1980年代轉化為政治公共領域。

文藝實踐本身也經歷了多重的轉化。其一、由於文藝場域內在的創新要求，懷抱社會實踐旨趣的文藝工作者已無法滿足於只從寫實主義的傳統對社會現實進行反映、說明與批判。其二、如果說現實生活的內容本身，已經因為消費社會發展，而變成了一種超現實，那麼對於這種現實生活的感覺，以及在這種感覺的驅動下所做的文藝表達，就無法只局限在寫實主義的風格當中。其三、文藝表現本身因為新技術媒介的出現也有了不同的發展，例如紀錄片：它結合了影像、聲音、文字，相對於此前的文學跟藝術，它提供了一種更具整合性的藝文表現方式。其四、在新的時代條件下，文藝從過往做為社會實踐的少數可能路徑之一，轉變為開啓新的可能性的社會實踐路徑，用來開展透過其他實踐方式所不易觸及的層面。

文藝創作與社會實踐之間，不只存在著親和關係，同時也存在著緊張關係。一方面文藝表現受社會條件所影響，另一方面文藝創作又力圖超越現實條件的束縛。如果文藝創作的能量源自於內心的觸動，那麼這股能量同時指向了兩個方向：一方面由於情感認同，而試圖把對象所經歷的生命，所遭受的困頓、苦難與美好表現出來；在另一方面，文藝的創造精神引領文藝工作者追尋心靈上的自由，希望超越現實條件對於創作動力的束縛。情感認同與追尋自由這兩種力量的關係，時而結合、時而緊張。正因為藝術創作聯繫著這兩種動力，以文藝進行社會實踐才引發許多的討論與爭議。

藝文工作者並不必然都將自己的創作理解為一種社會實踐，然而一旦尋求將自己的文藝創作與社會實踐相聯繫，現實主義文藝便成為一種重要的參照。它的積極作用在成為文藝創作的思想資源，而非創作的規則與束縛。它提供一種能夠結合藝術心靈跟淑世理想、結合心靈自由和情感認同的可能性，也由此通往一條艱辛但美麗的路途。

陳瑞樺，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助理教授。於2009-2012年間，與林麗雲、蘇淑芬共同組成工作團隊，環繞著吳耀忠進行一系列包含了講查、出版、畫展、演講、座談的文化研究／實作計畫，名為「尋畫」。